

被选为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作紧张而又繁忙，张乃召总是抽出时间与群众谈心，交流思想，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甚至对年轻同志的婚姻问题也常常挂在心上，热心帮助牵线搭桥。他十分关心基层台站气象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试图找到一个解决艰苦台站工作人员轮换的办法，并积极向国务院领导反映，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念念不忘艰苦台站的同志，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继续向上反映，争取尽快解决。他还时常用在艰苦台站工作的同志的感人事迹教育子女，要他们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张乃召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他相信党，始终不动摇

自己的革命信念，一切以党的事业为重，竭尽全力做好每一项工作。

1978年7月，张乃召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住进北京友谊医院。在病重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前往医院看望。1979年3月17日，张乃召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67岁。4月1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张乃召同志追悼会，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王任重以及张平化、杜润生等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了追悼会。

张乃召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气象事业，他光辉的业绩和高尚的品德将永载史册，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摘编自《延安时代的气象事业》等资料，1995年4月，气象出版社）

“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吴金鼎

○吴鲁锋

吴金鼎，字禹铭，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万戈庄人，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曾就读于济南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李济学习人类学。1930—1933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助理员。1933年被山东省政府选派留学英国，193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并归国。1941年任史语所副研究员，1942—1944年任史语所技正。

吴金鼎是民国时期最早在国内学习考古相关专业的一批学者，当时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担任导师，其开创之宗旨是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对

学生的录取条件有严格的要求，而且每年限定招生数量。根据当时吴金鼎的同届同学、后任职华东师范大学的戴家祥先生回忆：“当时李济老师所讲的考古学与我们过去所讲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在第二届同学中，只有吴金鼎一个人选择了这门专业。”因此，李济对吴金鼎热衷于考古事业的影响非常大。

吴金鼎与《平陵访古记》

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肄业后，吴金鼎任教于齐鲁大学。期间，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田野调查。1928年春，吴金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前往济南市平陵地区进行

□ 人物剪影

考古考察时，意外发现章丘县龙山镇以东的城子崖处，有不同寻常的堆积，经过一番调查，吴金鼎认为此处地下很可能有古代遗址的埋藏。其叙述说：“闻乡人言其遗址极大。砖瓦碎块亦极多，余闻之，欣然期往……”于是，1928—1929两年间，吴金鼎共6次到平陵地区调查，并记录于《平陵访古记》一文中。其在序言中写到：“近数年来，余在山东作古迹考察。岁月所致，亦略得有所发现……余所发掘及捡拾者，几千万分之一耳。今以此些微之发现，公之于世。聊以请教于好古之士耳。”

从《平陵访古记》撰写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吴金鼎对于田野考古考察工作精致入微，每次所得结论都有充分的专业知识作为依据。在对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性质作了初步判定后，吴金鼎把这一情况向其清华的导师李济作了书信报告。李济收信后感到十分兴奋，即刻赴济南随吴金鼎到临淄和龙山镇地区进行现场查看，当场做出了此处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判断。对平陵地区的考古调查既是吴金鼎涉足田野考古的开始，也是他从事考古事业学术研究的开端。他的发现对促成史

语所最终选择北方城子崖遗址为山东考古发掘的第一站起了关键作用。

城子崖发掘与龙山文化研究

吴金鼎是城子崖遗址的发现者，也是龙山文化的发现人。1930年11月，考虑到城子崖遗址的重要性，史语所决定先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吴金鼎如愿以偿参加了两次发掘工作。

1930年11月7日，城子崖遗址开始第一次发掘，此次发掘以李济为领导，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李光宇、王湘等人参与，此次进行一个月，至12月7日结束。遗址中发现了黑陶时期的围墙和窑洞，出土器物有陶片及骨、石器、蚌等标本23878件，其中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城子崖遗址中所发现的黑陶对于整个考古学界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具有划时代意义，当时考古界称其为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李济将城子崖发掘所获得的物品全部交由吴金鼎整理、记录。经过半年的时间，吴金鼎将城子崖遗址发掘的石器、陶片等整理、记录完毕，撰写了《龙山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一文，文章对该次发掘活动进行了分析、总结。

1931年10月，由梁思永领导吴金鼎、王湘等人进行第二次城子崖发掘。10月31日发掘结束。1934年出版的《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一书，全面记述了龙山文化的发掘原因、经过及收获。吴金鼎对这一考古报告贡献很大，该书共分为七章，吴金鼎一人撰写了第三、四章：“城子崖地层之构成”和“陶片”，与其他学者合作撰写了四章，



吴金鼎（左）与梁思永

几乎所有章节的撰吴金鼎都有参与。李济在序言中写到：“初稿大部分是吴金鼎君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手中的时候，要比现在的多一倍以上，可见他用力之勤了。”由此也可看出吴金鼎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整理工作中投入了巨大精力，并得到了史语所同仁高度评价。

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只是龙山文化的开端，在接下来的十几年考古活动中，在国内很多地区陆续发掘出了与龙山文化相关联的古代文化遗址。在总结城子崖遗址发掘的意义时，李济写到：“由这遗址的发掘，我们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要是我们能寻出城子崖的黑陶文化的演绎秩序及所及的准确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解决一大半了。我们相信，这不但是田野考古工作一个极可遵循的轨道，而且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将成一个极重要的转点。”“虽然不可说没有吴金鼎就一定没有龙山文化的发现，但吴金鼎却是凭其丰富的考古知识及田野经验，成为发现龙山文化的第一人。”

学术转折 留英深造

参与城子崖发掘是吴金鼎第一次以考古学者的身份参加的考古活动，也是吴金鼎从事考古专业学术研究的开端。在进入史语所的最初几年里，吴金鼎跟随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考古学者参与了安阳殷墟第四、六次及城子崖第二次发掘。

1932年6月，吴金鼎在参加完两次安阳殷墟发掘工作后，对此次最新收获进

行总结，写成《摘记小屯迤西之四处小发掘》一文。在此报告中，吴金鼎将安阳殷墟与城子崖遗址中发掘出的陶器相比较，得出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所以，仅仅以出土陶器的区别，吴金鼎便得出了龙山文化要晚于仰韶文化的论断。在参与安阳高井台子处发掘后，吴金鼎又撰写了《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一文，吴金鼎通过对三种不同颜色陶片的研究分析，推断三种陶片虽然在同一地点发现，但从其发掘的土层来看，它们分别代表了史前陶器发展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而且可以肯定三种颜色陶器的制作均已使用轮制，脱离了纯手工制作。对于陶器的细致观察分析，不仅使吴金鼎在安阳殷墟中发现了与龙山文化相关联的文化存在，而且发现了三种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凸显出了吴金鼎所具备的专业考古能力。

1930年，吴金鼎凭借发现并参与城子崖遗址为契机进入史语所考古组，当时傅斯年为史语所所长，而且二人为山东老乡，其对吴金鼎也大有照顾。鉴于吴金鼎在考古学上的重大贡献，在傅斯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及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等学者的多方努力下，山东省政府与史语所共同出资，于1933年7月，选派吴金鼎和其妻子王介忱前往英国，跟从叶兹教授（Professor W. Perceval Yetts）攻读考古学博士。

有关吴金鼎留学英国的诸多细节记述并不多，但同时期在英国留学的夏鼐在日记中对其二人的交往多有记述。1935年夏天，夏鼐准备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考古学之前，在参加安阳殷墟实习中结识了由英国返回考察最新出土陶器的吴金鼎：

□ 人物剪影

“我和吴先生的初度相识，是民国二十四年春在安阳侯家庄的工作站。那时他正由英返国来搜集论文材料，偷空暇跑到我们的发掘团来看看。他的诚恳，他的模样，初见面时便令人心折，相见恨晚恨晚。”初次见面，夏鼐便对吴金鼎留下了良好印象。

1935年5月19日，夏鼐与吴金鼎会面并听取了吴金鼎对中国陶器制作发展的讲述，在日记中记述到：“听吴君讲陶器制造法，并述及近年来考古学趋势，专重有史以后，将史前期交给人类学去办。又谓近年来考古学多不赞成从前石器、铜器、铁器那种的分期法，至于将社会进化分为游牧、农耕等期更是过时的说法。又谓商代多用慢轮，但是黑陶时代似已用快轮，汉代亦用快轮，又谓绳纹鬲之绳纹，并非范制之结果，乃用绳做一圆柱状物印于其上，先纵后横。并谓在伦敦时，曾做实验，目下考古学颇注重试验云。”与吴金鼎的接触使夏鼐受益良多，并对其留下“吴君谈锋甚健”的印象。

吴金鼎在求学期间积极参与考古发掘活动。1933年冬季，吴金鼎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大师皮特里教授（Professor F. W. Petrie）参与中东巴勒斯坦地区考古发掘工作。在皮特里1933年11月18日至1934年4月4日一季田野报告《古代的加沙之四》中写到：“我们接待过一位中国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关于这段经历，夏鼐曾记述说：“我经过耶路撒冷城晋谒彼特里教授谈起吴先生时，这位87高龄的老教授还掀着银须说：‘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勇锐机警，但沉着勤奋，工作罕匹。’在巴勒斯坦

碰到几个跟吴先生做过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吴先生都跷起大拇指说他‘夸依思’（汉语‘顶好’），吴先生也常以幽默的语调，叙说他在巴勒斯坦跟从老教授工作的经验。”能得到考古学大师皮特里的如此评价，可见吴金鼎的考古专业水平已有很大提高。

吴金鼎在英国留学期间更是投入了大量时间观摩、研究史前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陶片，并将其论文题目选定为 *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中国史前陶器》）。在撰写其英文版论文时，吴金鼎不仅专门进入英国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进行学习、模仿陶器的制作方法，还对英国伦敦地区所有的博物馆陶器藏品认真考察，几乎翻遍了当时有关陶器的所有书目，以求得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深入了解。1938年，吴金鼎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获伦敦大学出版基金及Sir Percival David及Mr. George Eumorfopoulos资助，出版发行。《中国史前陶器》一书中，对于陶器、陶片的分析只是手段，其



1941年参加四川彭山崖墓发掘时考古队员合影。
左起：吴金鼎、王介忱（吴夫人）、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写作目的就是最终通过对全国各地发现的陶片的梳理，构建一个中国史前文化传承发展的年代顺序表。吴金鼎的博士论文出版对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的贡献及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吴金鼎与西南考古

获得博士学位后，吴金鼎于1937年回国。1938年初，国内抗战局势急剧恶化，史语所也不得已由湖南长沙迁到云南昆明。10月，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同组建了“苍洱古迹考察团”，时任团长的吴金鼎，带领妻子王介忱、曾昭燏两位女性成员以及其他成员，从事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勘查及发掘。11月18日考察团到达大理，吴金鼎便主动前往当地教育局联络，并与地方政权和士绅人物进行商洽，以寻求地方对调查团活动给予最大的支持。云南苍洱古迹调查团的活动是抗战时期考古调查团在西南地区历时最长、范围最大、发掘最多的一次活动。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吴金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在国外学习的考古学专门知识以及西方先进发掘技术得以充分利用。

调查团历时两年多，对云南苍洱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工作，整理完成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该报告是西南地区考古史上最为详尽的著作，也为此后西南地区考古发掘提供了详细指导。据统计，考察团在苍洱一带标记遗址32处，发现古代遗迹6处，探明古代墓葬17座，判定其为南诏时期的遗存。吴金鼎等人在此期间的活动，对于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史前文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41年春，由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

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合作组成了“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再次担任团长，王介忱、曾昭燏、夏鼐、陈明达等为团员，在川藏交界地区进行考古勘察活动。此次活动最大的收获是探明汉代崖墓900多个，并对其中70多个墓葬进行发掘。挖掘过程中，工作人员对每一座墓葬均制作了详细的勘测记录，并绘制了完整图纸。可见当时中国考古学在输入了西方科学理念以后，考古发掘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吴金鼎等正是民国时期第一批系统学习国外考古知识的新一代考古学者的代表。

1943年春，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四川省立博物馆联合组成琴台整理工作团，吴金鼎担任团长，王振铎、王文林、刘绎和、冯汉骥、莫宗江等为团员。吴金鼎致信李济：“今春鼎在蓉参观华大及四川博物馆时，私立小小志愿，希于三年期内愿见中央博物院所有藏品在全国居首位，并使自己在汉代考古学上得有一知半解。自发现牧马山葬地后，此志益坚……”吴金鼎诚挚朴实的语言，表露出他对中国考古事业未来发展的远大目标。

参军报国

1944年，面对日军残酷的“一号作战计划”，国民党在各大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召集各界知名人士在重庆召开“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后颁布《知识青年从军办法》《优待知识青年从军办法》，会议决定在全国征召青年学生，编成新军。

吴金鼎是在琴台整理工作结束后提出参加军事委员会的，1944年3月6日，吴金鼎致信傅斯年说到：“所中经费，深能体会，数年来深感经济压迫，国家情形如

□ 人物剪影

此，现决意投军委战地服务团，谅必能见允。”对于此事，夏鼐在1944年3月18日日记中也有记述：“至傅孟真（傅斯年）先生处，闻吴禹铭君提出辞职，拟入军委战地服务团……”军旅生活中的吴金鼎因英语较好，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和盟军招待所，任四川新津美国空军第二招待所主任，负责英美空军的饮食、娱乐、翻译等服务工作。离开史语所，离开热爱的考古事业，吴金鼎的内心是极其痛苦和矛盾的，在给傅斯年及史语所同事的信中，他有数次表露。7月17日，吴金鼎致信傅斯年：“蒙准请假，至为感激，军中生活颇异，希暂习而可以适应，琴台报告已完大半，每日仍能抽暇读书，引以为乐。”信中自然流露出了吴金鼎在军中生活的痛苦。在得到傅斯年的特殊“照顾”下，吴金鼎在空闲的时候还不忘进行学术研究。然而此事到此并未结束，抗战结束后吴金鼎也未能返回史语所。

英年早逝

1945年抗战结束，吴金鼎受其母校齐鲁大学邀请，赴成都华西坝组织该校复员、内迁工作。由于吴金鼎没有从史语所辞职，属于“请假兼事”，所以再次致信傅斯年请求辞去史语所的职务：“胜利消息传来，实可喜可贺，现已呈请上峰乞脱军籍，谅可邀准。唯以母校齐鲁大学年来迭经风波，拟趁机略尽绵薄，谨此请求准予解除技正职务，等半年或一年后，再听命从事田野考古。”其实吴金鼎离开史语所多有无奈之处，以其对考古的热爱，更是难以割舍。1945年10月，吴金鼎在致夏鼐的信中提到：“自胜利以来，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早

返所陪诸兄再晒太阳也。”

1945年10月，齐鲁大学在济南复校。吴金鼎继续在校工作，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校长室西文秘书，后任训导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图书馆主任等职。繁重的学校事务使得吴金鼎无暇再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他曾多次致信夏鼐，吐露心中烦闷。1946年2月，吴金鼎与史语所一别，竟然再无机会追求其学术之梦想，1948年8月16日，他因胃癌病逝于齐鲁大学，年仅47岁。

面对吴金鼎的逝世，当时中国考古学界都为之惋惜、悼念，“同行友人，由凋丧一人，殊为伤心。”夏鼐听此消息，连夜赶写悼文一篇，发表于《中央日报》，文章说：“在中国考古刚刚发轫的时代，像吴金鼎这样正统派的田野考古学家，尤为需要，只有多做田野工作，多发现新材料，然后才能进一步做切实可靠的综合的工作。”而正是吴金鼎在田野考古中不断发现的文物史料，使得中国在史前时期和汉代的相关史学研究上取得了极大成绩，也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夏鼐并作英文信一封，寄与叶慈教授，托其在英国发表。

梁思永曾对吴金鼎如此评价：“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石璋如在其撰文中写到：“时间上下数千年，地区纵横数万里，涉猎经验之丰，文化贡献之多，直到现在为止，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呢？称得起田野考古第一人。”

吴金鼎为中国的考古事业辗转大半中国，其短暂的一生尽数贡献给了中国考古事业。据统计，他一生参与的田野调查20余次，发掘古遗址约26次，直到现在为止，仍称得起“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